

翻译的默认值、参照点与体验性^{* 1}

——论“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差异与共性

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116029)

提 要: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基于5个层面比较研究“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以期解析两种翻译方式的深层结构。这两种翻译方式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认知顺序上具有像似性。研究表明:一方面,同一个译者在进行同一部作品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时存在默认值差异、认知参照点差异和隐喻方式差异;另一方面,译者在两种翻译方式里也突显认知体验共性和翻译共性。

关键词: 默认值;参照点;体验性;语内翻译;语际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1-0085-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1.015

Default Values, Reference Points and Embodiment in Translation

— On the Differences and Universals of Intra-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Chen Ji-rong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ep structure between intra-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explores five-level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these two translation methods. They exhibit continuity in time and iconicity in cognitive sequence. The result proves the following points: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lator shows cognitive differences on default values, reference points and metaphorical approaches, though she translates the same text in intra-lingual way and inter-lingual way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lator shows the cognitive embodiment universals and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 these two methods of translations.

Key words: default value; reference point; embodiment;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1 引言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论述“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在默认值、认知参照点和隐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体验共性与翻译共性。本文研究对象是清朝末年海派小说《海上花列传》(简称《海上花》)的英译本。该书的原作者是清朝的韩邦庆,译者是我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孔慧怡等修订最后的英译文)。

2 语内与语际翻译的认知差异

2.1 默认值差异

默认值是框架理论(Minsky 1975; Fillmore 1982, 2003; Lakoff 1987; Taylor 1995)的一个子范畴。Lakoff认为,认知框架有无数槽孔,框架就是由这些槽孔组成,激活某个框架,这些槽孔就会被明示或隐含的信息所填充(Lakoff 1987: 116)。“槽孔值本身是开放的,需要在意义结构网络中给予填充。默认值就是在没有提供明确语篇信息情况下的槽孔值,是框架中未特别指明的方面,是隐匿于符号之下不言而喻的语义值。”(汪立荣 2006: 211)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可在原文符号的引领下发掘语言事实背后的隐含意图,并

*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合作项目“认知语用翻译研究”(L15EYY005)的阶段性成果。

通过默认值填充来获得语篇的连贯性与语言的整体意义。

在语内和语际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理默认值的方式是不同的。《海上花》是古典小说,叙事用文言,人物对白使用苏白,原著有 64 回,回目采用对仗的方式,还含有一定量的诗词、曲赋和酒令,体现古文语法特点。其语法默认值指与现代语言相比古文的词法、句法以及修辞所蕴含的属于语言结构内部的默认值,这些可以在单句的意义结构网络中进行意义填充,具有一定的结构意义。如《海上花》回目中名词、代词、冠词省略的情况比较多,这是由古汉语的语言特点决定的,而汉语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测出名词、代词等的所指。这些默认值是汉语读者生活世界中能自觉填充的一部分,但对英语读者来说,就须要将其显化才能构成英语读者头脑中完整的意义网络。

笔者详细比较了原著前 21 回的回目翻译,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语内翻译没有做任何语法方面的改动,因为中文读者多少有些古文的阅读素养。回目的题目都是与每一回的中心事件有关,没有生涩的文化典故,叙事简单、明确、自然,且符合一般古典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这种“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的叙事回目在大众文学里非常流行,如古典小说、讲唱文学、弹词、宝卷等。这些对汉语读者来说都是文学传统积累下来的默认值,储存在中文读者的认知框架里,形成一定的认知模型。所谓“认知模型就是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王寅 2006: 204)。理想化的认知模型就是建立在许多这样的认知模型之上,并能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做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就《海上花》回目的语内翻译而言,汉语读者的认知模型涉及到关于回目的概念、特性及概念间的关系,具有判断性的特点,是客观外界在心智中的事实性映射,不须要运用任何想象性手段。基于这种认知默认值的特点,回目的语内翻译基本没有形式上的改动。

回目的语际翻译情况有明显差异,语法显化的特征非常明显。汉语中在很多情况下会省略主语,但在英语语法中除祈使句以外,很少有省略主语的情况,所以在汉译英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把省略的主语,也就是省略的语法默认值,进行显化以达到交际意义。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默认值翻译显化,下表是关于回目英译明显增加的语法标记的统计。

表: 《海上花》回目英译语法增添形式表

| 增添项 | 不定冠词 | 定冠词 | 系动词 | 物主代词 | 介词 | 第三人称谓语动词 |
|-----|-------|-----|-----|----------|----------------|----------|
| 数量 | 37 | 13 | 7 | 13 | 22 | 29 |
| 明细 | a, an | the | is | his, her | by, on, in, at | 单数动词+S |

从明显的语法增添标记来看,各类语法标记增加的量有差异,按照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不定冠词>第三人称谓语动词>介词>物主代词和定冠词>系动词。(1)不定冠词增添的量占首位,说明在英语的默认值中涉及到指称的泛指情况非常突出,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这种高度简约且对仗的回目形式,英语自然会使用默认的语法比较来填充意义空白,而英语中的泛指是其中最为普遍的认知默认值。(2)排在第二位的是第三人称谓语动词+S,因为《海上花》每一回都是在描述一个中心事件,所以在英译回目的过程中要突出事件的时间性,第三人称动词加上S的情况也很突出,这也反映出英文读者对语法视点体的默认值。“所谓视点体就是说话者运用语法手段对情状内部时间结构的不同观察角度的描述。”(瞿云华 2008: 5)从中文回目来看,由于讲究对仗和工整,没有出现能够描述准确内部时间结构的词语,如“小伙子装烟空一笑,清倌人吃酒枉相讥”,即没有表示“正在”状态的“在”或者“着”,也没有表示完成的“了”,但从古典章回小说起源于讲唱文学的传统来看,为了使故事的叙述生动形象,采用一般现在时比较贴切,也符合中文朗读时的节奏习惯,这也符合英语读者对事件内部结构的认知默认值。(3)排在第三位的是介词。英文中介词的添加既符合英语语法,也反映了英文读者的认知默认值。具体来看,回目英译所增添的介词分别为 on 5 个, in 5 个, by 5 个, at 7 个。这些都是英语读者的动觉意象在描述“始源一路径一目的地图示”时的默认值。(4)排在第四位的是并列两项,一是定冠词,一是物主代词。具体来看,译文增加了 3 个 his, 10 个 her, 13 个定冠词 the。这反映了英语读者对语篇连贯默认值的认知状况。不论是定冠词还是物主代词都是特指,特指的信息是在前文描述过的,所以对英语读者而言,定冠词和物主代词都是一种指示意义上的默认值。(5)排在最后一位的是系动词 is,除一处是固定短语搭配外,其余都是形成被动语态的用法。被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表明主语和宾语是分离的、具体的实体。中文回目只围绕中心人物描述中心

事件,有时会省略主语,这是英语译文添加被动标记的原因。由于回目中所述的事件是短暂的,尽管动作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事件的中间状态并不是焦点,所以此类语法标记的添加在所有形式中所占比例最小。

总结回目的语内和语际翻译可见,语内翻译更多体现一种语言的历史传承性,在默认值方面体现出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特点,而且有内部激活、内部消化的特点,这种语言深层和表层结构在默认值方面双重的一致性使得语内翻译的语言表层结构没有太大改变。而语际翻译更多体现出语言的现实性,在默认值方面体现出说话者运用认知手段对事件内部结构的不同观察角度的描述。这种基于认知默认值的描述以泛指意义最为突出,也体现事件结构的内部节奏,并反映动觉意象的心理图示,这些认知默认值方面的差异带来翻译语言形式上的差异特征。

2.2 认知参照点差异

兰格克认为,认知参照点原则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普遍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经验之中。“世界可被想象成有无数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于特定的观察者来说,其突显度有很大差异,就像夜晚天空中的星星,有些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而其他只有经过特别努力地寻找才能发现。突显事物可作为寻找目的物的参照物。”(Langacker 1991: 136)

在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是在一个界面内,围绕这个一致的起语形成叙述,构成目标语。由于认知参照点的起始位置与起语的起始位置相同,具备了内在的连贯性,因此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趋同性。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也是在一个界面上,起语的深层结构与译者的认知相一致,但是在围绕起语形成叙述的过程中,语言现实发生变化,显现在目标语上也出现差异。由于认知参照点在语言现实层面与起语发生变化,翻译语言表层结构出现剪刀叉意象,因此语言上呈现出认知象似性和形式差异性。

原著: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勃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韩邦庆 1996: 26) 语内翻译: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我要板面孔的!”张寿随口答道“不要说什么面孔了!你就板起屁股来,我们……”(张爱玲 2003: 43-44)

语际翻译: Stumped for a better reply, she could only come up with, “Watch it, or I’ll lose my

temper!” “Lose your temper? Even if you’re to lose your trousers, I...” (Chang, Huang 2005: 35)

语内翻译的认知参照点与原文的起语一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实现格赖斯提倡的语言合作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要符合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可以说,这一实例中的语际翻译最大限度地实现格赖斯的语言合作原则。从量的准则来看,译者把“倪”译成“我”或“我们”,“耐”译成“你”,“勃”译成“不要”。译文做到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没有多于需要的信息。从质的原则来看,译文几处将吴语方言中的常用词语,如人称代词译成现代汉语的做法,在吴语大字典中均可找出出处,而“勃”译成“不要”,也是原作者韩邦庆在本书例言中有所引证,这样的翻译有足够的理据。另外,从关联原则和方式原则来看,语内翻译也充分实现合作原则的要求,这是语内翻译的认知参照点内置于原文世界的逻辑性结果。

就语际翻译来看,翻译的认知参照点是语言的形式逻辑。在汉语中“板起面孔”和“板起屁股”有关联性,但在英文中“板起面孔”的翻译要保留其比喻的作用而不是保留其语言形式,将其翻译成 lose your temper 以后与后面的“板起屁股”更加无法构成关联。考虑到“板起屁股”的比喻作用再考虑 lose your temper 与其的关联性,译者采用 lose your trousers。这种抓住比喻意义并考虑命题作用和图示作用的语际翻译,其认知参照点是翻译活动所依据的认知逻辑。

2.3 隐喻方式差异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基于象似性,是理想化认知模型的扩展。亚里士多德最早定义隐喻为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事物。换言之,隐喻是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王寅 2006: 403)。莱考夫和特纳认为“隐喻不是一种语言表达式,而是从一个概念域到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它有3个结构:两个端点(始源域和目标域)和一个连接两个端点的喻底(细节映射),这些结构受极大的限制”(Lakoff, Turner 1989: 203)。从隐喻的分类来看,可以包括种属分类、活跃隐喻与非活跃隐喻、不同词性的隐喻、不同形式的隐喻等。其中最能体现认知特点的隐喻是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分类,他们将隐喻分成3部分:(1)结构性隐喻: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2)方位性隐喻:运用诸如上下、内外、前后、远近、深浅、

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3) 本体性隐喻: 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

结合上面关于隐喻的定义、分类,再根据中西方隐喻认知的差异,会发现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过程中,隐喻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海上花》全书涉及到隐喻翻译的实例共有 26 处,其隐喻翻译的方式差异见表₂。

表₂

| 比较项 | 语际翻译 vs 语内翻译 | 数量 |
|------|--------------|----|
| 形式 1 | 显化 | 14 |
| 形式 2 | 一致 | 5 |
| 形式 3 | 简化 | 4 |
| 形式 4 | 增加 | 2 |
| 形式 5 | 超句层隐喻 | 1 |

由上表可见,在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语际翻译与语内翻译的方式存在差异,差异各项排序为:显化>一致>简化>增加>超句层。语际翻译比语内翻译更为显化,占总数的 53.8%。这是因为在同一语言系统内,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界标和射体更具趋同性,而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概念域的张力增大。对于隐喻这种具有认知相似性的心智活动来说,语内翻译更为突显体验的相似性和无意识性,而语际翻译则在深层的语言结构中具有体验相似性,在表层的语言结构中突出不同的文化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体现在翻译的语言上就形成一种显化的表达方式。排在第二位的是“一致”,占总数的 19.2%。这 5 例隐喻中,第 1 例、第 2 例和第 3 例是描述人的感官体验,如触觉“耳边风”,听觉“爆豆”,视觉“落珠”,第 4 例和第 5 例是用生活中通常可见的事物来描摹形容词,如“宽阔”(猪耳朵)、“坚硬”(龟壳板)。这些共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体验使得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出现了一致性的特征。排在第三位的是“简化”,涉及到中国文化典故,这些文化典故并不构成核心的概念域,译者在语内翻译中保留了原型,在语际翻译中将其省略,这一部分占总数的 15.4%。另外,在隐喻翻译的过程中,语际翻译比语内翻译多了两项,一是在原文没有隐喻的地方增加隐喻,一是做了一处超句层隐喻,这些既体现了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体现了隐喻的开放性。

3 语内与语际翻译的共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认知语言学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对

世界的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Ungerer, Schmid 1996: X) 在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这一路径中,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或称体验)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翻译语言也是译者对翻译现实世界的一种认知体验。语言具有同构性,这是翻译可以进行的基础。语言又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参数,激活不同的默认值来进行转换,这是出现不同翻译形式的基础。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存在共性,笔者将其分成体验共性和翻译共性两部分。

3.1 体验共性

首先,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对生命的体验是相同的,无论在哪一种语言里,人类对世界的最初体验也是最深层的体验都与其身体(或生命)体验相关,而人类对周围世界的最初感官认知具有象似性。例如,手碰到火会感觉灼痛,身体浸入冷水会感觉冷。这些最基本的生命体验既反映语言的体验性,也反映语言的人本性。这些共性反映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概念结构上,说明两种翻译方式背后的认知方式是相似的。

《海上花》中最为突显的感官体验是听觉体验,具体包括跺脚声、擂鼓声、闲言碎语声、酒令声、管弦声等。这些是人对自然界声音(或者来自人类本身的声音)各种听觉感官的体验,这些体验在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那里都具有听觉认知象似性。所以,不论是语内还是语际翻译,其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是相同的,体现在语言形式上也差别不大。《海上花》中第二类感官体验是触觉体验,例如,心痒的感觉、冷水浇头的感觉、烈焰炙心的感觉、疾风扑面的感觉。这些都是描述人的各类敏感的触觉,也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形成的共同体验。《海上花》中第三类是生活体验。如上当、泛酸、帮忙说话、厮打、温锅等,这些不论是在语内还是语际翻译中也表现出人际意义和逻辑关系上的共性。《海上花》中第四类体验是心理和情感体验。如吃醋、遇鬼、打情骂趣、拌嘴、踌躇不安、痛哭流涕、心理感应,这些不论是在语内还是语际翻译中也表现出共性。

3.2 翻译共性

我国学者吴昂和黄立波在 2006 年曾发表过论文《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对西方学者的翻译共性研究做出详细介绍和评价。2011 年,胡显耀和曾佳又发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新趋势》进一步评述翻译共性研究。“翻译共性,亦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Baker 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即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 相对于目标语原创语言 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特征。这一定义有两重含义:第一,翻译共性是特定语言模式的概率性分布特征,主要在归纳的基础上获得;第二,翻译共性由翻译过程本身造成,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无关。随后,在此基础上的翻译共性研究不断深入、细化,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论。”(吴昂 黄立波 2006: 296) 吴昂等在肯定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翻译共性研究的局限,认为对翻译共性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翻译过程本身,还应当从具体语言、翻译方向、译者因素、文体类型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胡显耀等区分第一代翻译共性研究和第二代翻译共性研究,指出各自的特点,并分析目前对翻译共性中显化、简化、传统化的研究,指出新的研究趋势,如译入语的独特性降低、原语干扰、异常搭配等(胡显耀 2011: 56)。

“Explicitation,即显化的概念由 Vinay 和 Darbelnet 提出,指对原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上下文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示。20世纪80年代,Blum-Kulka 提出著名的显化假设,即显化可能是翻译文本和二语习得等语言中介活动中具普遍性的策略。”(同上: 57) Séguinot 对 Blum-Kulka 的显化定义提出质疑,认为 Blum-Kulka 的解释混淆解决语言问题的某些策略,并提出自己的显化定义:“显化在翻译中的语境应为:在两种语言中有一个译文,不能用结构差异、文体差异或修辞差异来解释。换言之,应有一个不够显性、不够精密、待修改并可以精确修改的文本,而这种准确性的选择是由翻译过程的本质而引起的”(Séguinot 1988: 108)。Baumgarten 指出,在研究翻译显化时应研究“显性”(explicitness)和“显化”(explicitation)两个词,因为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研究通常使用“显性”一词,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导向的研究倾向于使用“显化”一词。他认为这两方面研究都很重要:“一方面,显性研究可探讨语言结构表面的词汇与语法;另一方面,语言显化中使用的术语可衡量两种表达可比变量的不同”(Baumgarten 2008: 179)。

综上所述,翻译显化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可以理解为,译文语言比使用此种译入语作为自然语言写作更加突显语法、词法、句法和篇章等层面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或者阐释性,更注重读者的阅读期待。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中,都有比原文更加显化的方面。从最为明显的语法特征来看,《海上花》原文中不论男女第三人称一

律用“他”,以前五回为例,共有66个“他”,其中有27个实际上指的是女性人物。考虑到现代语法的准确性,译者在语内翻译中将上述各例的“他”都翻译成了“她”,并且在语际翻译中都使用了 she。这是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中明显的翻译显化,而且是共性的翻译显化。

黄立波曾将翻译显化分成语内显化和语际显化两大类。“一类显化是指在译文中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目的在于更清楚地传达原文中的语法和非语法信息;相反的过程则被称为隐化,即根据译语语言规范隐去原文中语言成分的过程。另一类显化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译语中非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显性程度提高”(黄立波 2008: 455)。黄立波所说的语际显化和语内显化不是根据到底是语内翻译中的显化还是语际翻译中的显化来进行分类的,而是根据比较的类型来分类,其本质差异在于语际显化与译文和原文的比较有关,语内显化与译文和该语言的天然语言创作文本的比较有关。胡显耀曾指出:与同一语言的非翻译文本相比,汉语翻译小说倾向于使用更少的词汇,重复使用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实词减少等。这些特征反映了当代汉语小说翻译的“简化”和“常规”操作规范(胡显耀 2007: 214)。张爱玲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中也采用了“简化”的策略,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符合汉语读者对译文语法的传统化期待。

此外,从数量相似性和顺序相似性的角度来看,《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也体现出共性特征。如第二十二回有讨论吴雪香买莲蓬首饰的内容,从数量相似性的角度来看,原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3段文字的字数分别是136字,137字和89字。语内翻译和原文的字数很接近,只差一个字。语际翻译表面看和原文相差47字,但是考虑到中英文的拼写差异,一般情况下中文及其英译的字数差异保持在80个字以内都属正常,所以这里的47个字已经非常接近了。从顺序相似性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是围绕吴雪香买了假莲蓬,众人对此事的不同评价而写的。作为雪香的相好,葛仲英直言不讳说她买了假货上当了,而黄翠凤心机颇深,虽然认出假货但不点破,罗子富毕竟是男人,直接要过来看看,黄翠凤怕他说真话,赶紧阻止,暗示他别说,罗子富终于心领神会。本段写了三处“不识货”,第一处是雪香虚荣,不承认自己上当。第二处是翠凤重复雪香的话,一方面给雪香面子,另一方面阻止子富说出真相。第三处是子富明白翠凤所思,终于没说破,既给了雪香台阶,也给了翠凤面

子。这3处语内翻译的“不识货”在英文中都用 *no expert* 短语来表达,不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都具有认知顺序象似性。

4 结束语

作为典籍翻译的两个重要环节,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是共生互动的。做好典籍的古文今译是进行典籍外译的基础,因此,在时间顺序上,语内翻译一般早于语际翻译。但是要实现典籍作品在世界文学领域里的文化资本价值,语际翻译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研究表明,文学资本的不均等分布是与语言文学的不均等分布相匹配的。他特别指出,汉语虽然被广泛地传播,有灿烂的文学传统和相当数量的言说者,但是在世界文学市场上却很少得到认可,这种结构的不平等意味着翻译必须经历地位的竞争(Baker 2010: 304)。汉语典籍翻译仍然任重道远,从认知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差异与共性将对其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 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小说词语特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3).
- 胡显耀 曾佳.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新趋势[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1).
- 黄立波. 英汉翻译中人称代词主语的显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6).
- 瞿云华. 基于双语语料库的汉英视点体对比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汪立荣. 隐义显译与显义隐译及其认知解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3).
-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王正元.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吴昂 黄立波. 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5).
- 张爱玲. 海上花开[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
-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Baker, M.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 Baumgarten, N., Meyer, B., Ozcetin, D. Explicitn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Critical Review a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8(2).
- Blum-Kulka, S.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A]. In: House, J., Blum-Kulka, S.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 Tübingen: Günter Narr Verlag, 1986.
- Chang, E., Huang, E.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Fillmore, C. J. Frame Semantics [A]. In: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 Seoul: Hanshin, 1982.
- Fillmore, C. J. Double Decker Definitions: The Role of Frames in Meaning Explanations [J].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03(3).
- Hansen-Schirra, S., Neumann, S., Steiner, E. Cohesive Explicitness and Explicitation in an English-German Translation Corpus [J]. *Languages in Contrast*, 2007(2).
- Heaney, S. The Jayne Lecture: Title Deeds: Translating a Classic [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4(4).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insky, M.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A]. In: Winston, P. H.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C].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5.
- Mona, B., Saldanha, G.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 Ogle, M. B. Further Notes on Classic Literary Tradition [J]. *Modern Language Notes*, 1914(8).
- Séguinot, C. Pragmatics and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 [J]. *TTR*, 1988(2).
-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96.

定稿日期: 2016-07-31

【责任编辑 王松鹤】